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双重的遏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
东亚政策

蔡佳禾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DAXUE
BOSHIWENCONG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双重的遏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
东亚政策

蔡佳禾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蔡佳禾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蒋树声等主编)
ISBN 7-305-03396-0

I. 双… II. 蔡… III. 美国对外政策-东亚-
1953~1961 IV. 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102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双重的遏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著 者 蔡佳禾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3 千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17.00 元

ISBN-7-305-03396-0/D·395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丛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公平公开、规范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前 言

60年代末期，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即否认早先的现实主义学派对该时期对外政策的批评，否认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从僵硬的意识形态出发而忽视了美国的真正利益。新的研究成果普遍赞扬艾森豪威尔在对外事务中所起的“幕后”作用，认为他的一些重大决定使美国在50年代没有陷进象越南战争那一类的麻烦之中。罗伯特·迪万在《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中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否决性”的，他拒绝干涉印度支那，他结束了朝鲜战争，他避免了同中国在台湾海峡作战，拒绝为苏伊士运河问题作战等等。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克制”、“冷静”与“精明”的作风堪作美国后任总统的楷模。这些观点被称之为“对艾森豪威尔研

究的修正学派”。^①

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档案解密开放，更多的外交史学家投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现了大批依据解密档案完成的成果。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后修正学派”兴起的时候。因此“后修正学派”的观点很快影响了对艾森豪威尔对外政策的研究，并且拓宽和加深了研究的范围与深度。“后修正学派”并不为艾森豪威尔政策作全面辩护，但肯定其基本成就和重大决策。斯蒂芬·安布罗斯在他的权威性传记《艾森豪威尔传》中说道，这一时期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正经历着高速增长，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得到了保证，它的海空军基地遍布太平洋地区，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着全面优势。安布鲁斯也承认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有些问题，但是他

① 在艾森豪威尔离任前已经出现了一批抨击他的著作，如 Marquis Childs, *Eisenhower, Captive Hero,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General And The President* (New York, 1958); W.W.Rosto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An Essay In Recent Histor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0)。现实主义学派对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批评见 Hans J.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in *An Uncertain Traditio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by Norman Graebner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61);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艾森豪威尔研究的修正学派的主要著作有 Herbert S. Parmet, *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Macmillan, New York, 1972); Peter Lyon, *Eisenhower, Portrait of the Her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74); Arthur Larson,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Nobody Knew* (C. Scribner's Son, New York, 1968); Richard H. Immerman, "Eisenhower and Dull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Autumn 1979); Fred I.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2); 有关艾氏研究修正学派的介绍见: Mary S. McAuliff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 68. No. 3 1981); Robert A.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1) pp. 154-155.

认为这并不妨碍对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作出积极评价。^①

由于这些观点的影响，关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历史地位的评价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60 年代初，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只能排名在美国最糟糕的十位总统之中。但到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历史学家们已倾向于认为，他可以同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几位美国总统媲美。在 60 年代，杜勒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五名国务卿之一，但到了 80 年代末，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过去对杜勒斯的“简单主义旧框框”已被打破，他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出乎意料的杜勒斯”。有人预料他的历史地位还会继续提高。应当指出，美国历史学界中的这些变化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的。60 年代末开始的对艾森豪威尔研究的“修正”同越战的失败有明显的联系，也与当时美国全球地位下降，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有关。同当时“新左派”激进的批判锋芒相反，关于艾森豪威尔的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保守主义特点，他们被认为对 50 年代拥有强大实力和“领导地位”的美国抱着“怀旧感”。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昔日霸权时代的“怀旧”。70 年代末期外交史研究中的“后修正派”的兴起与此时美国社会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回升有关。这种思潮希望弥补越战失败造成的社会分歧，建立一种新的“共识”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一些迹象表明，随着美国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历史学界

① 后修正学派的主要著作有：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 - 1976*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76); 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t.2,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4); 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H.W. Brands Jr., *Cold Warriors, Eisenhower's Gener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

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对 50 年代外交政策的评价还在进一步提高。^①

然而，艾氏研究“修正学派”与“后修正学派”的观点并不是不受挑战的。一些美国历史学家仍然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持否定态度。罗伯特·麦克马洪指出，艾氏研究“修正学派”的观点“忽视、降低或错误地解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主要成份，“因此严重地歪曲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历史。一些研究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成果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力图将第三世界国家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发展问题纳入美国的反共冷战战略中去。这种政策非但不能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而且严重损害了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阻碍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② 从这里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艾森豪威尔研究“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主要是从美国对欧洲和苏联的政策中得出了他们的基本结论，并且极大忽视了对当时的第三世界，尤其是对当时的东亚政策的研究。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欧洲中心论”仍在影响着这些人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注意东亚或整个第三世界的地位。第

-
- ① 关于艾森豪威尔历史地位的评价请参见：Richard B. Melanson and David Mayer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87) 这些文章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后修正学派的观点。还可以参见 Steve Neal, "Why We Were Right To like IKE", *American Heritage*, (Vol. 37, No. 1) pp. 49 - 62; 关于杜勒斯地位的变化请参见 Richard 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这本论文集中有编者关于杜勒斯地位变化的概括介绍，也参看该书中 John L. Gaddis, *The Unexpected John Foster Dulles*. pp. 47 - 7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0); 当然现实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放弃对杜勒斯的批评，如诺曼·格雷伯纳仍然对他持批评态度。
- ② Robert J. McMahon, *Eisenhower and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A Critique of the Revisionis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 1986), pp. 457 - 473; Blanche Wiesen Cook, *The Declassified Eisenhower: A Divided Legacy* (Gaden City, N. Y., 1983)

二，美国史学界有关东亚及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滞后于对欧洲政策的研究。现有的艾森豪威尔东亚政策研究还局限在关注危机问题或重大事件上，局限在对一国政策的研究上，对整个东亚政策的系统研究仍然很少见到。这种情况正在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情况也正在改变。因此，考虑到 60 年代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考虑到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以及进入 80 年代后东亚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在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作出全面研究之前，对 50 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作总体性评价是过早的，也是不适合的。^①

毫无疑问，美国历史学家们在战后东亚政策研究方面是有丰富成果的，特别是在关于杜鲁门时期的研究方面，成果就更引人注目。实际上如何评价艾森豪威尔的东亚政策也涉及到对杜鲁门时代的评价。例如，关于亚洲“冷战”的起源问题，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一问题与杜鲁门时代有关。马克·加利齐奥的著作《亚洲冷战的开始》把起源时间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但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亚洲冷战自身的特点和对象，并把亚洲“冷战”仅看成是对苏“冷战”的另一条战线。因此，这种观点就难以解释亚洲“冷战”政策为何经历了完全不同于欧洲“冷战”的发展。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迈克尔·沙勒等人认为，

① 艾氏修正派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一些最近出版的艾森豪威尔传记都接受了这些以美国对欧政策和对苏政策为依据的观点，请参阅 Robert F. Burk, Dwight D. Eisenhower, *Hero and Politician*, (Twayne Publisher, Boston, 1986) pp. 126 - 145. 一些历史学家正在呼吁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有关东亚政策的研究中去，见 Richard A. Melanson and David Mayer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Fifties*, pp. 1 - 10; Richard H. Immerma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Y, 1990) pp. 281 - 283.

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亚洲冷战政策形成于1947年。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在这一年大幅度修改了对日本的政策。这一观点没有揭示亚洲“冷战”的对象究竟是谁，因此仍然接近加利齐奥的想法。著名的历史学家入江昭认为在1950年以前美国并没有亚洲“冷战”政策。他认为这一政策形成于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与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这一段时间内。

入江昭认为，应该把亚洲“冷战”概念与实际的“冷战”政策分开。这一想法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澄清冷战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的区别。但这一有价值的想法似乎没有证实入江昭自己的上述观点。因为，如果在1950年6月前，美国已经有了一套明确的亚洲“冷战”政策，美国又如何会不顾中国的警告，想用武力“统一”朝鲜并卷入一场同中国的有限战争呢？“冷战”政策刚刚形成就卷入了“热战”，这本身就是对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完整性提出了疑问。因此，仅仅在杜鲁门时代研究“冷战”起源的做法上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①

在有关美国50年代对华政策的研究中，有关杜鲁门时代的研究已经成果斐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有了大量著

① 冷战研究中的激进修正学派的代表作有：Gar Alperowitz,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72); 研究冷战的后修正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迪斯，其代表作有：*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 -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2); 入江昭是美国著名的远东史专家，他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了美国与远东地区的关系，他的著作对新一代的美国东亚史研究人员具有重大影响，关于他的冷战起源的观点请参见 Yeonosuke Nayai and Akira Iriye e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7); Marc S. Gallich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作问世，一些旅美华人学者对这个领域的进展作了很重要的贡献。共和党政府是否从民主党政府继承了遏制政策？另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来对付中苏同盟？加迪斯和戴维·迈耶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从共产党各国的关系是“铁板一块”的立场来考虑对华政策的，他们了解中苏两国的关系和分歧，并采取了更为精明的方针来促使中苏两国的分裂。加迪斯认为艾奇逊想通过对中国让步来使中国放弃同盟，他把这一政策称之为“裂变”，而杜勒斯则采取一种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来实现同一目标。他把后一种方法称之为“聚变”。这些观点为了解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政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角度。但人们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即“压力”政策仅仅是为了促使中苏分裂吗？如果是这样，中苏在50年代末分裂时美国为什么不改变这一政策呢？可见“压力”政策还有其他目的。历史学家们较为一致地同意，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多地关注欧洲问题和对苏联的政策，而把对华政策放在一个相对低的地位。南希·塔克提出过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她认为艾森豪威尔试图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但为了防止保守派对缓和的攻击，他有意识地制定了一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以便在对苏政策和其他问题上仍可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可惜的是，塔克没有提供很有力的材料来论证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保守势力阻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一种更为现实的对华政策。当然，仍然有一些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持尖锐的批评态度，诺曼·格雷伯纳坚持他的观点，即美国的僵硬政策既不能使美国摆脱所谓的“危险”，也不能使美国和中国达成妥协。这种政策没有阻止中国的进步，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内外政策。南希·塔克也认为，艾氏研究的“修正学派”

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强调的新材料并不能改变中美关系中“一些基本事实”。^①

在对东亚政策的研究中，取得大量成果的另一课题是有关越南战争的研究。在早期发表的论著中，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几乎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一致批评。但涉及到具体问题，历史学家们仍有许多分歧。一些艾氏研究“修正学派”的史学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在越南问题上是小心的，他的政策比其前任与后任总统都更精明。他们以艾森豪威尔拒绝在军事上卷入奠边府战役为证据，高度评价其对越南问题的政策。但越战史专家往往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由“一系列错误”构成的，在越南问题上战后历届政府都做过一些重大决定。当年率先捅出五角大楼侵越战争秘密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认为，从艾森豪威尔开始，历届总统都有意欺骗人民。埃尔斯伯格认为，

①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Wiley, New York, 1980); W. I. Cohen, "Acheson, His Advisers, And China", in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1947 - 1950*, ed. by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New York, 1980); Nancy B. Tucker, *Pattens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New York, 1983). 对科恩和塔克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的著作有 Gaddis,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Uncertain Years*, pp. 61 - 118; Robert A. Blu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 1982); 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 - 1950* (Chapel Hill, 1981); 中国学者的著作有 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 - 1950》(重庆出版社, 重庆, 1987);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 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 1995 年) 关于中苏同盟问题见: J.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es into the History Of Cold War*, pp. 147 - 194; David A.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1949 - 1955* (Baton Rouge, 1986); Nancy B. Tucker, "To isolate China: The First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in Asia", (A Paper per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t Beijing, China, Oct, 1986).

越南战争的根源是 1949 年“失去”中国，以及这一事态对美国政治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乔治·赫林在其杰出的越战史著作《美国最长的战争》中指出，这场战争并非是政治家们个人判断失误造成的，它是遏制政策本身造成的。美国错误地判断了问题的性质，并把它作为一场重大国际冲突来对待，其实它只是一场地方性的斗争。赫林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出，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并没有从法国的失败中得出教训，反而相信美国在越南一定会成功。赫林的这些观点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但是他还没有从整个东亚的大背景来考察 50 年代美国对越政策的目的。^①

进入 80 年代，象加布雷尔·科尔科这样的激进派史学家仍在深入分析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并详细研究越南社会本身的变化。但是他多少忽视了这场战争进程中的国际背景，没有中、美、苏等大国的卷入，越南战争的强度、性质、范围显然不会象人们所看到的结果那样。从这个角度看，70 年代末出现的“越战史修正学派”的一个观点倒也是有启示意义的。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它是“绑着自己的双手”来打这场仗的。保守主义的“越战史修正学派”试图证明，美国本来可以打赢这场战争。这种设想，从历史学角度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提出的具体观点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美国为什么

① 关于越战史研究的评论见：Robert Divine, *the Vietnam Reconsidered*,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8)；支持艾森豪威尔越南政策的著作有 Robert A. Divine, *Eisenhower and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也参见：George Herring and Richard H. Immerman, “Eisenhower, Dulles and Dienbienphu: The Day We Didn't Go To The War Revisi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 71, Sept. 1984)；George Herring, *American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 (New York, 1979)。

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绑着自己的双手”打仗呢？是什么因素限制着美国的行动？也许这个问题也必须在整个东亚问题的背景中才能找到答案。^①

目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研究已进入了更深层的领域。“后修正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已不再对“谁该对此负责”这一类问题感兴趣。他们已把视野深入到美国及越南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历届美国政府面临的“具体困难”上。乔治·卡欣的《干涉，美国如何卷入越南》一书为人们了解美国的逐步卷入提供了新的途径，他指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0年代支持吴庭艳政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戴维·安德森详细研究了国务卿杜勒斯，以及其兄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扶植吴庭艳政权一事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越南政策。从1953年到1961年，这是美国对越关系史上的关键时期。但至今还没有一本论述这一时期美国对越政策的专著出现。^②

-
- ①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Mor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85); 越战史修正学派产生于70年代末，其思想主流接近极端保守主义，他们试图证明，越南战争是符合美国基本利益并且是能打赢的。主要代表作有 Gua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1978); Timothy J. Lomperis, *The War Everyone lost And Won* (Baton Bouge, 1984)。
- ② Melvin Gurtov, *The First Vietnam Crisis: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and U.S. Involvement, 1953 - 1954* (Westpoint, Conn, 1985); Melanie Billings - Yun, *Decision Againt War, Eisenhower and Dien Bien Phu, 19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R. Irving,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French - American Policy, 1945 - 1954* (Groom Helm Press, London, 1975); Herring and Immerman, *Eisenhower Dulles And Dien Bien Phu*.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最新著作有英国历史学家 James Cable,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On Indochina* (Sr Martin' s Press, New York, 1987)。卡欣和安德森的论著非常出色，他们使用了极有价值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George McT. Kahin,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1986); David L. Henderson, “J. Lawton Collin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s ' Point At No Return' In Vietnam” in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88) 这些著作也为我们了解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的越南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他们的研究还突破了那种把莫边府危机时期的政策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印支政策的方法。